



The Lore of Cathay

(美) 丁韪良 著
沈 弘 等译

汉学菁华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及其影响力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The Lore of Cathay

汉学菁华

(美)丁韪良 著 沈 弘 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菁华 / (美) 丁韪良著; 沈弘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5

ISBN 978-7-5062-8590-2

I. 汉… II. 丁①… ②沈…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955 号

本书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汉学菁华: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著 者: (美) 丁韪良 译 者: 沈 弘 等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责任编辑: 李佳庆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老三余工业开发区 邮编 100027)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页 4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 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062-8590-2/C·55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1282469

前 言

《汉学菁华》与《花甲忆记》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姊妹篇。《花甲忆记》忠实记述了作者在华长期生活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和亲身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外部生活。而《汉学菁华》则反映了作者在长期与中国文人、学者密切交往中所观察注意到的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学识,以及中国教育的定位。

本书的内容包括经过修改和扩充并增加了许多新素材的《翰林论文集》。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本书是作者原创性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从中国教育到中国炼丹术的一系列不同的题目;冒昧地相信自己对于东方文学、科学和哲学的某些领域具有一些新的见解;而且作者还可以丝毫不过分地宣称,古代中国的国际法和外交是他独自发现的一个研究领域。

《三国志》中有一个说法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印证,并被视为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基本法则,那就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目前,那些离心的力量正表现得异常活跃。即使它们最终导致中华帝国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也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也许会使中国人民加速获得西方的文明。在新生活的刺激之下,中国人民必将重建国家,使其成为文明世界强国中的一员。

除了光绪皇帝之外,满族统治者在不情愿地对西方列强作出让步的同时,在心底深处对中国人民总是潜藏着一种“顾虑”。然而奇怪的是,随着大清国每一次被外国列强所打败,这种“顾虑”目前已经降低,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所发动的戊戌变法中几乎消失了。

为防止暴行的再次发生,有必要在中国倡导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

和谐相处的气氛。正如马汉舰长^①所说：“对处于目前状况的亚洲，欧洲已认识到，由于它与亚洲之间所存在的利益共同体，有必要将亚洲人民接纳到基督教民族大家庭的范围中来。他们必将坚持东西方思想之间的交换媒介——在中国领土上与中国人自由地交流思想。商业和思想互动中的开放门户应该成为我们在中国每一个地方的目标。”

这种思想互动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相互间的思想理解。假如中国要成为文明国家中的一员，西方人就必须理解作为中国历史和生活基础原则的中国思想。作者将《汉学菁华》一书奉献给英语世界的公众，也正是希望推进这种理解。

丁韪良

1901年7月1日于北京

^① 马汉舰长(Captain A. T. Mahan, 1840—1914)是美国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美国海军大学教官。

序 篇

中国的觉醒



说到中国没有能力改革,我们将首先来看一下在第一次中英战争^①之前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然后我们将回顾一下在随后五十年内中国所采取的改革步骤。最后,我们将简略描述一下在光绪皇帝领导之下的改革运动。这次戊戌变法更有资格被视为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了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在这样一个国度居然还存在着民族心态这么一种东西,这件事本身就是个证据,说明中国还是易于改变的。与此同时,它也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保证。它证明中国并非是一个庞大的珊瑚虫堆积体,并非每一条珊瑚虫都躲在它狭窄的杯形座里;中国也不是一个工场和一座坟墓,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在辛苦地劳作,他们以共有的同情心作为激励,思想的灵光时常碰撞。它证明中国并不像非洲和土著人的美洲,甚至不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那样,只是集合在一起的一群部落,后者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感受。中国是一个整体,公共生活的强大潮流席卷了它所有的成员。

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吸收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总是被一股显示出中华文明惊人能量的同化力转变成中国本身的价值。由于外部和内部影响的结果,中国也经历了许多变革;虽然这种转变过程经常是十分缓慢的,但这些作用力总是会扩展到整个国家。在中国本土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佛教和道教的传播被局限在某一特定省份的事例,也没有任何地区对于中国依靠共同语言和共同情感而产生的巨大心脏搏动不作出迅速反应的。

^① 即 1840 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然而这种大一统和同情心的存在,这种在一系列可能性的范围内带来大规模调整的民族心态,必然会在它们迅速实现的道路上造成障碍。由于根植于深厚的古代基础,国土辽阔无垠,而且骄傲地意识到自身的伟大,中国人的惰性本身就是反对变化的。因此,在中国无论是政治、宗教或思想大革命,其实现过程总是缓慢的。与某些西方国家中实现此类革命的便利程度相比较,它们就像是太阳系边缘上那些庞大行星一样在缓慢地旋转。就连小小的水星也要花三个月才能围着太阳系的中心转上一圈。

一个社会在解体时期和重建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动态变化通常需要一至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由于那些重大变革所造成的一种宗教或哲学的勃兴和发展,则必须用世纪来计算了。

把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将能使我们更好地懂得现在正在发生的这场思想运动的本质。

首先来看一下政治观念的发展。中国人民并没有一成不变地生活在一个暴虐政府统治之下,而是经历了许多像古罗马或现代法国那样的政府形式。当古罗马人在经历从国王到执政官,再到皇帝的更换统治者这一过程时,中国人的统治者也经历了从“帝”到“王”,再到“皇帝”的变更过程。而且正如法国经历了封建集权的帝制、军事暴君统治和共和国等各种不同阶段那样,中国文官政府的形式也显示出了相同的多样性。

当历史之手在公元纪年两千多年前刚刚拉开帷幕时,它向我们显露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帝制,人民的声音被当做表达了天意。作为古代圣君的尧是由贵族们推举到帝位上去的,尧的哥哥因行为不端而被撇在一边。尧本人也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而是让贵族们提名一个继承人,结果舜被选中继位。舜后来又越过了不成器的儿子,把皇位传给了一位能干的侍臣大禹。

虽然大禹是一个好的君主,但他背离了这些著名贤君的做法,因此他被后人批评为“将国家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家天下”。世袭制度从那时起便固定下来,帝王家族的分支都被分配了部分的国土,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封邑,封建制度得到巩固。

这就是古代中国一种经典的政府形式,但它在两千年以前被历史记载上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革命所彻底推翻。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采用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帝王制,没有邻国,也没有国际交往的概念。这便成为中国与来自西方和东方强大民族发生矛盾的多事之源。

在汉代——大约在公元纪年刚开始时,一种更为重要的变革,即一种民主的因素,被介绍到了国家政体之中,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依赖于帝王及其宠臣的心血来潮。这种变革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测试诸位候选人的能力。这种制度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不仅被采纳,而且还在后继的朝代中得以大大的改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被使用。如果真的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严肃、正规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公共职务成为文学成就的奖赏,并使得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努力而出人头地的机会,美国人也会马上放弃他们的选票箱的。

中国人对于宗教思想领域中的变化也并不生疏。自从公元6世纪以来,中国的竞技场上就已经出现了三种宗教制度鼎立,相互争夺支配地位的局面。儒教在秦代受到了迫害,道教和佛教则交替扮演迫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其矛盾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并且在历代君王中都有其各自的信徒。而这最后出现的佛教,其根源是在国外,它的普遍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后来更加易于接受从国外传入的宗教思想,而且它也是一个明证,证明了中国人皈依一种外国信仰的可能性。中国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①曾经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不应该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秦汉以降,”他说,“儒教衰微,佛教兴盛。佛教乃源自印度,但很多印度教徒摈弃佛教,皈依回教。罗马天主教之信仰源于西方,但西方有些国家却采纳了新教,并以此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宗教随着时代的变更而兴衰,唯有儒教经万世而犹存。”曾国藩出言谨慎,丝毫没有流露他对基督教所抱有的同情,而且他绝不会提倡接纳基督教。但他希望让皇帝陛下放心:即使基督教成功地取代了佛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人民仍然坚信他们那位古代圣人的基本教义。杰出

^① 指南京总督曾国藩。——原注(原文如此,应为两江总督或直隶总督。)

人物承认时代变化的可能性是一件大好事,即使这种变化只是以假说的形式出现。

除了这些宗教革命之外,还有好几个思想觉醒的时期,这些构成了文学史上几个非常突出的阶段。

第一个这样的阶段是由孔子的教诲所引起的。另一个阶段处于一个世纪以后孟子的时代,当时儒教的伦理基础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修正,人们围绕着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第三个更为重要的觉醒过程是在被嬴政^①所烧掉的典籍又像凤凰那样在灰烬中得以重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它们像密涅瓦^②那样完整无缺地从对这些经典倒背如流,现已德高望重的学者们那些博闻强记的头脑里蹦出来时所发生的。

这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唤醒了民族心态的环境本身也将这种努力导向了古代记载文本的确立,但它并没有停止在那儿,竹简、木简等笨重的古书材料被麻布、丝绸和纸所取代。材料的便利和精美对于大量印制书籍和刺激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

然而对于振兴学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印刷术被发现之后的那个时期。在公元 177 年左右,皇帝下诏令将改编后的圣书文本刻在石碑上,以防止另一次被焚的危险。肯定有人从这些石碑上制作了拓片,于是印刷术很早就有限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但直到公元 8 世纪,它才被广泛地用于制作书籍。

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并非书籍生产率的增长,而是原有的文学得以改进。它以“诗歌的时代”而著称,李太白、杜甫和一批不那么有名的诗人出现在地平线上。唐诗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标准诗歌的最佳教材。

随后是宋朝的统治(公元 960—1279 年),中国人的心智在当时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文人们开始着迷于哲学的冥想,并且试图阐释本体论中

① 即秦始皇。

② 密涅瓦(Minerva)是古罗马神话中主管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根据神话传说,她一诞生就已经是成人,并且是全副武装地从她父亲朱庇特的头脑里蹦出来的。

最为深奥的问题。周子^①、郑子，还有著名的朱熹，均以辨析入微和大胆探求而闻名于世。虽然口头上是在阐释古代哲学，但他们实际上是创立了一门新的哲学——泛神论的唯物主义学派，它至今仍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以往的两个朝代^②中，思想成果也是层出不穷。说实在的，中国人心智的丰富性似乎是难以穷尽的。虽然没有像宋代那么具有大胆的原创性，但每一个朝代都具有各自的崭新风格——明朝的作家以粗犷的文风为特征，而大清的作家们则以清新优雅的风格取胜。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都保持如外人所认为的那样“铸铁般的”一成不变。他们当然是古代文化的崇拜者，并且思想极其保守。但是他们并不像人们所通常认为的那样，满足于把古代圣贤那一小部分最精华的思想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而不去增加或修正这些思想。中华文明的精髓，就像任何其他文明的精髓一样，并非是必须放在一个匣子里加以珍藏的宝石，而是必须加以培植和改良的种子。事实上，这种修正已经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外来的因素不时被嫁接到土生土长的树木之上，而且中国的文人在回顾历史发展的进程时，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只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除外。被提升到宗教虔诚这一高度的孝道，作为家庭联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像一根金线那样贯穿了所有的时代；通过一个人作为天子来加以实行的君权神授原则，受到民意即天意这一对应原则的制约，也见之于每一个时期，以作为文官政权的基础。

虽然不像它那些飘忽不定的对应物那样反复多变，但是中华文明内部经久不变的因素确实很少，而不断在变化的因素却有很多。回溯漫长的中国历史，在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到大胆的改革和激进的革命，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预期同样的事情将会发生在未来。有了这些先例和这种思想活动的特征，中国人在跟基督教文明接触和碰撞时，几乎是不可能不

① 即周敦颐，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著有《周子全书》又名，《周濂溪先生全集》。

② 从上下文来看，丁韪良所指的应该是明朝和清朝，他显然没有将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列入他讨论的范围。

受到后者之深刻影响的。

实际上,这种影响确实是非常深刻的,尽管它并不是马上就显现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军事、商业、宗教和科学的综合影响。其中有一些影响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施加,而且其效果是相当明显的。近年来所有这些影响加在一起,就像是用氢氧吹管来煽风点火,其热度足以熔化一座金刚石的大山。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由于闭关锁国,自然不会受到西方太大的影响。西方列国离中国太遥远,不足以引起中国人的担忧。但是当轮船和地峡的运河将它们拉近的时候,而且当它们在两次战争中显示了能够在每一次战役中都能打败中国人的能力之后,它们给了中国一个教训。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训,任何想要给中国人带来益处的企图,都会被证明就像是从山脚扬水来浇灌山坡上的草木那么困难。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中国人首次确信他们可以从西方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在1860年结束敌对状态后的一年之内,人们已经看到有大量的中国军队在外国教官的率领之下,在他们刚刚被打败的战场上学习外国军队的战术操练。在四个重要的战略地点建起了军火库,里面堆满了从外国进口的军事武器;在两个主要的海港建起了海军造船厂,中国本地的机械师们在那儿学习如何建造由蒸汽机驱动的炮舰。

中国的军事工业进展神速,以至于他们自以为已经可以对付第一流的军事强国,直到甲午战争最终驱散了他们的幻想。

在其他方面的教育也没有被忽视。在广东兴办了一所专门训练翻译员的学校,在京师也建起了一所同类型的学校。这两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从满人或是那些家庭在清初就已被满人所同化的汉人中挑选出来的,这足以反映统治阶层的心态。清政府并不想把新式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扩展到那些汉族臣民。当时有一位满族政治家颇具远见卓识——那就是总理衙门的首领文祥。他促使皇上将同文馆的大门向获得举人和进士头衔的汉人开放,但那些傲慢的举人和进士拒绝到同文馆学习。同治帝之师倭仁则谴责这个提议,认为让博学的举人进士们去当外国人的学生有损于中国的尊严。作为翰林院的首领,他鼓励翰林们都去反对这一改革。由

于不能够说服学历高的文人来同文馆学习,文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学历较低的人中选拔学生。获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从三十个增加到了第一百二十个,课程表也得以扩充,除了外语之外,还包括了理科和文科的课程。同文馆成为帮助推动进步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的同文馆毕业生在学校和军火库找到了工作,还有许多毕业生被派到外国公使馆做随员。有两位毕业生还荣幸地成为尚未成年的皇帝陛下的英文教师,他们被要求向这位身为皇上的学生提供字迹娟秀的手抄本课文,而不是印刷的书籍。他们每次都把这些手抄本先拿来给我看,以免出错。我也可以在这儿提一下,我在同文馆得到的第一个教职就是教一个班的十名男孩英文。没教多长时间,我就提出了辞呈。一位年长的总理衙门大臣对于同文馆的前途富有远见,他问我辞职的理由,我告诉他这个教职对于我来说,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不要以为它微不足道,”他说,“你的学生中有的也许会成为皇帝的老师。”

毋庸赘言,这个说法彻底打消了我辞职的念头。不仅他的预言后来变成了现实,他自己也为实现这个预言贡献了许多。而且在同文馆进一步扩大时,我还被任命为总教习兼国际法教授。这个双重的教职我担任了二十五年,直到我因身体不好而辞职为止。

我们的学生在赴驻外公使馆工作之后,有的做了译员,有的做了文书,一些做了领事和副领事,还有一两个人甚至被提升为尊贵的特命全权公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驻法国公使庆常。^①

那些公使馆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教育机构而不受重视。每一位公使及其随员都自认为是在执行一项探索的使命。有时候一位公使会将他的观察和评论写成厚厚的好几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随员们会将自己的游记刊印成书。这些出版物不会像公使的正式报告那样被束之高阁,而是具有能唤醒阅读阶层的效果。

① 前驻英国公使曾纪泽侯爷虽然并不是同文馆的学生,但我曾经私下给他授过课,他对我总是执师长之礼。——原注



丁韪良总教习与京师大学堂全体教职员合影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容闳先生所倡导的海外留学。通过他和他的后继者,大约有三百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少年被带到了美国的赫特福德市,接受各种专业的训练,借此使他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正如我在别处所讲述过的那样,这些留学生最终被召回,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男孩子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在那之前,派学生出国留学主要还是官方行为,其目的是为清政府培养人才。与甲午战争之后所掀起的留学运动相比,这些早期选派留学生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中国战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促使人们去认真地思考造成中国屈辱的原因。那些曾经蔑视同文馆的傲慢学者,即翰林们,现在终于明白,日本人胜利的原因是新式教育给日本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力量源泉。他们开始在京师组织强学会等改革俱乐部,后者很快就传遍了全国的许多地方。他们向林乐知博士、李提摩太神父和李佳白神父等传教士们征求意见。他们受到了总督和巡抚们的鼓励。湖广总督张之洞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来引领这次运动,他认为改变教育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1897年,著名的广东学者康有为来到京师参加会试。通过博取皇帝

的信赖，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地位。他深信中国若想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就必须模仿日本的榜样。他的一番话使皇帝充满了激情，想要率领臣民走改革的道路。

皇帝颁下了一系列的诏令，所有这些诏令都经过深思熟虑，但又充满了革新的精神。他提出在通过科举考试为政府选择人才时，不应该只比书法的漂亮和作诗的好坏，而应考科学和实学的能力。基于这一观点，他命令各省清理各类祠庙，并将它们改造成普通的学校，这一敕令被他的臣民们视为无异于没收财产。他也命令在各省成立中小学和高等学堂，并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以聚集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将他们训练成有用的人才。我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这个京师大学堂开办了两年，共有十名西学教习和十二名由中国人担任的副教习，后者大多是教会学校的基督徒毕业生，直到爆发义和团运动使得它不得不停办。

义和团焚烧翰林院藏书楼，将京师最丰富的图书收藏付之一炬，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投入水中浸泡毁坏。物极必反，这种疯狂的后果肯定会给教育改革事业带来一个新的推动力。

目 录

前 言	1
序 篇 中国的觉醒	1
第一卷 中国对于技艺和科学的贡献	1
第一章 中国人的发现	3
第二章 中国人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里的冥思	11
第三章 中国的炼丹术:化学的起源	20
第二卷 中国文学	41
第四章 中国的诗人和诗歌	43
第五章 儒家伪经	51
圣人受教于小儿	53
造假的酬金	54
孔子拒绝神化	62
第六章 孔子与柏拉图:一个偶然的巧合	64
第七章 中国的散文作品	68
第八章 中国的书信写作	80
第九章 中国的寓言	90
第十章 中国本土的说教作品	93
第三卷 中国的宗教和哲学	103
第十一章 “三教”或中国的三大宗教	105
附一:光绪皇帝在天坛	127
附二:衍圣公——孔子的继承人	129

第十二章	中国的伦理哲学	134
第十三章	中国人有关灵感的看法	151
第十四章	为基督教作准备的佛教	163
第十五章	中国人的祭祖	174
	祭祖与三教的关系	176
	祭祖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178
	祭祖与基督教的关系	182
第四卷	中国的教育	185
第十六章	学校和家庭训练	187
	对于国民性的影响	187
	家庭教育	189
	学校生活的开始	191
	学习的阶段	192
	学校的等级	198
	政府机构	201
第十七章	科举考试	207
第十八章	翰林院	221
第十九章	中国一所古老的大学	248
第五卷	中国历史研究	259
第二十章	中国历史研究	261
	附录:中国的主要朝代	274
第二十一章	古代中国的鞑靼人	277
第二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国际法	291
第二十三章	古代中国的外交	307
译后记	一位被世人所遗忘的汉学家	沈弘 324
出版后记	用一生传播汉学的“福音”	331